

樱花谢了, 穿和服美人在花前怅惘——那是一幅凄美的图画。

樱花与美人

曹旭

我走过鸭川。

在一株高丈余, 树形如伞, 落英如雨的樱花树下, 有一片碧绿如茵的草地, 铺着一张米黄色的榻榻米。

榻榻米上, 五六个穿和服的日本女子, 以极其优美的姿势团团围着, 坐着, 身前是花, 身后是花, 头上是花, 地上是花; 花间一壶酒, 酒壶歪斜小酒盅; 酒盅边, 是金彩的螺钿漆盒, 盒子里装着日本的小点心——一幅美人赏樱小品。

她们身上的和服是粉红色的, 如云、如樱、如霞, 和身边花的笑靥映成一片——那是一个阳光很灿烂的下午。

我在河堤上的脚步开始迟疑, 不敢走进她们的图画里, 我怕我的鞋印, 会踩坏图画边缘, 便想从川流不息的川端通, 或者, 从喧嚣奔流的鸭川边上绕过去。

但是, 两位女子已经站起来, 点头笑着和我招呼。

很少有人在河堤下行走, 她们见我走过来, 好像认定有什么缘分一样, 微笑着请我过去; 而坐着的, 已经在位子, 其中一位朝着我做手势, 用日语说: “欢迎, 欢迎。” 请我参加她们的小聚。

是过生日吧? 我的第一感觉, 是她们中间有人过生日。再一看不对, 以为过生日的我真是一个俗物。

她们在春和景明的屏风前坐着, 谈着、品赏着, 一点点不为了什

么; 为什么非要过生日或达到什么目的才这么坐着呢? 在良辰美景前面, 功利心是一剂毒药。

要说过生日, 就算是樱花过生日吧。欣赏风景本身就是过节; 我们应该把四月里阳光灿烂的每一天都当成花的生日, 而不是权势或者金钱的生日。

她们已经把位置空出来, 但我没有坐下去, 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配。

我的鞋子太旧、袜子太脏。这么脏的鞋袜, 会弄脏她们的榻榻米。我只能像个小孩子似的, 傻傻地站着, 像站在唐诗宋词意境中间的一个牧童——朝远远的山, 浅浅的水, 潺潺的鸭川——发愣, 我觉得站着很和谐。

等我缓过神来朝她们看时, 不禁惊呆了——望若神仙的她们, 不是女孩子, 而是涂过脂、抹过粉、染过发、画过眉, 精心打扮, 衣服鲜丽, 年纪约莫六十多岁的一群老妇人。

她们, 每年都这么欣赏樱花吗? 她们, 年轻的时候一直很忙, 无暇顾及; 直到现在, 才有了宽裕的时间, 闲适的心情, 三五成群地携着酒, 提着螺钿盒, 来到河堤下, 以迟暮美人的身份, 品尝这迟到的美丽吗? 一阵风过来, 樱花随之起舞, 花瓣

瓣落下, 斜了, 偏了, 旋转、飘忽, 纷纷扬扬。

花瓣落在河里, 落在绿草上, 落在榻榻米上, 落在她们粉红的衣服和乌黑的发髻上。风过去以后, 她们振袖、拂衣, 互相拍去对方肩上的头上的落花, 互相品鉴对方眼中的自己。

以前在咖啡店里, 我也经常看到一些日本的老妇人, 优雅地坐着, 围成一圈, 互相依偎。她们等待什么, 又不等待什么; 欣赏别人, 更希望被别人欣赏。举手投足间的迟疑, 充满对逝去美的纪念。

几个日本男人从川原上过来, 又过去。他们低头走路, 没有人朝天看, 也没有人朝她们看, 没有人发现她们的美。也许这种景象太常见了? 或者日本男人太劳累? 审美能力下降? 还是没有时间?

我真的很感动, 心里充满了留恋, 觉得, 迟暮的美其实也是动人的, 以致我一步一回头, 不断朝她们看, 直到河堤和樱花树连成一片分不清。

为了寻找什么, 第二天, 我又故意走过河堤。见川在流, 花在飞, 草色凌乱; 但榻榻米不见了, 酒壶、漆盒、小果子不见了, 穿和服的日本妇人不见了。

即使在没有地震海啸的今天, 风也很狂, 花片更乱, 这就是日本的风景——“物之哀”? 这就是日本人生命的美——樱花一般,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短短一瞬么?



1986年10月11日上午, 齐心大姐在廖静文先生的陪同下, 来到北京人民剧场演员宿舍, 看望正在北京演出的上海昆剧团部分演员。齐大姐非常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 她说: “我们古代的文化, 给了近代、现代甚至当代文化以营养; 因此, 不能搞虚无主义, 要保持、发扬国粹。” 在谈话中, 她特别提出了: “陈永玲的东西要学下来, 不要流失。”

齐心大姐说的陈永玲, 是京剧旦角的“名家”和“杂家”, 初拜京剧名家筱翠花, 是花旦(筱(翠花)派艺术”的佼佼者。他又先后拜在荀慧生、梅兰芳、尚小云的门下, 中国的“四大名旦”他拜了三个。当时年仅二十来岁的陈永玲, 吸收了各流派的精华, 将其融为一体, 形成了自己“做工细腻、唱腔俏丽、扮相妩媚, 念白清亮、面部表情传神, 能够恰当地反映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的表演特色。尤其是他那炉火纯青的跷工, 更令人叹为观止。1947年, 年仅18岁的他被评为“后四小名旦”。

这么一位大家、名家, 遗憾的是少有传人。因此才有齐心大姐那句“陈永玲的东西要学下来, 不要流失。” 好在北京京剧团的优秀旦角演员常秋月, 有幸得到陈永玲先生的亲炙, 技艺长进, 令人难忘。

常秋月从小得到京剧名家崔荣英先生的传授, 学习筱派艺术,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后来又拜在荀(慧生)派大家孙毓敏先生的门下, 演绎荀派旦角艺术, 兼得荀、筱二派之风姿神韵。她的扮相甜美妩媚, 做、舞尽显功力; 嗓音嘹亮

玉润, 唱、念亦不凡。她的表演准确传神、入情入微, 往往着眼于细微之处并自成一格, 赋予人物新意和美感, 使其扮演的人物焕发出异样的光彩, 极具舞台感染力。

常秋月戏校毕业分到北京京剧院以后, “二小戏”(小旦、小丑)很少上演, 要演也就《秋江》《拾玉镯》。著名演员安云武对她说: “你要提高, 还得拜‘高师’, 你要找陈永玲老师学, 这可是重量级的。可是常秋月她不认识陈永玲, 安云武很风趣地说, 找陈永玲, 光我的面子也不行。但他认一个人, 那就是王金璐先生。只要王先生出面, 陈老师绝不会拒绝。”

果真不然, 陈永玲一口答应。

2005年9月, 正值中央电视台举办“全国京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 常秋月报名参赛的剧目是筱派名剧《战宛城》, 那是崔荣英老师教授的。陈永玲就给她增加了一些形体动作, 人物表情, 使常秋月一下子感到丰富了不少。初赛顺利通过, 接下来的复赛拿什么剧目参加呢? 陈老师决定要常秋月上另一出筱派名剧《翠屏山》。在

陈老师的亲授下, 短短一刻钟的时间内, 花旦行当唱、做、念的技巧全部展现了。因为这是一出“冷戏”, 连不少评委都说没见过; 京剧名家耿其昌看了以后就说, 这孩子是经过高人指点的。后来经另一位评委、京剧花脸名家陈霖苍(陈永玲之子)露了底, 大家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呢!

常秋月凭这两个剧目, 摘得当年“全国京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花旦组金榜榜首”桂冠, 红遍全国。

那时陈永玲先生身体已经非常虚弱, 他给常秋月教戏的方法是让她看录像, 结合录像说戏, 比方说《霸王别姬》, 演到“舞剑”的时候, 他会让常秋月仔细看, 并告诉她自己的舞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除此之外, 他在上海演的《打杠子》《打樱桃》, 在台湾演的《铁弓缘》等, 都是采用这种方法教授。常秋月深有感触地说: “这比手把手教的效果更好, 因为看的是他的版本, 又把他怎么处理、为什么这么处理的道理都给我讲了。”

遗憾的是, 陈永玲先生不幸于2006年去世了。他的传人本来不多, 希望常秋月能够挑起这个担子, 也实现齐心大姐的愿望: “陈永玲的东西要学下来, 不要流失!”

常秋月的“独门秘籍”

秦来来



谁在教育谁

蒙佳

回家的路上, 母亲和儿子谈论的话题是, 人和人之间应该相互尊重。

拐弯角是一个垃圾中转站, 两个环卫工在奋力地挥舞着铁铲。

儿子腿长, 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前头等待母亲。母亲快步跟上, 空气中污浊的恶臭使她下意识捂了捂鼻子。母子并肩继续前行。儿子转过身, 正色道: “妈妈, 您刚才不应该捂鼻子。” “为什么?” 母亲不解。 “这对环卫工不尊重。您连屏息一分钟都做不到吗?”

母亲汗颜。

很多时候, 我们在孩子面前以家长自居, 事实上, 我们常常分不清, 是在教育孩子, 还是孩子在教育我们。

记忆中, 从繁华、热闹的闵行渡口上岸, 沿沪闵路便直达大上海——乡下人向往的另一个世界。浦南人想要见识这“另一个世界”, 必须跨越黄浦江。于是“渡口”成了奉贤人走向“大上海”的咽喉。

我的家乡有两个渡口: 一个在郭桥的耀光村, 乡人俗称“小摆渡”, 因为船小靠人工用橹摇, 就比较危险, 只有附近的农民才去乘坐; 另一个是位于肖塘的西渡口。那里有两个码头, 一个渡人, 一个渡车。渡人的码头, 去时不用买筹码, 回来时花六分钱买一个塑料筹码, 进门时往箱子里一扔, 算是检票了。渡船的码头边, 车队常会排成一条长龙。

渡口给我的记忆远不止这些。如今, 每次来到渡口, 面对奔涌向东的浦江水, 联想起和渡口有关的那些爱痛交加的往事, 五味杂陈……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 温饱成了人们生存最基本的问题。一家四口人, 我和哥哥没有分到自留地, 队里分得的口粮又少, 一天三顿只能喝薄粥, 掺杂糠菜, 那是常有的事。

缺粮, 饿肚子,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近乎天方夜谭, 可那时确实确实发生在无数像我这样的农户中。为解决温饱, 母亲养了几只母鸡, 蛋是舍不得吃的, 即便我们面黄肌瘦。等积攒到三四十枚时, 母亲携着我, 挎着竹篮步行到西渡口。

摆渡船虽破旧, 但在

我眼里已是个稀罕的庞然大物。随着拥挤的人群, 我和母亲上了船, 船上的座位很少, 也早已被年轻人捷足先登了。母亲在地上铺了个布袋让我坐下, 自己则提着装满鸡蛋的篮子站在一边。渡船的马达发动了, 我的屁股被震得一阵麻木, 只得得汽笛一声长鸣, 翻滚的浪花在船头涌起, 渡船向对岸缓缓驶去……

年幼的我虽有坐船兴奋, 但更多的是疑惑: 为什么要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好东西送给别人? 母亲说, 是为了换回镇上“居民户”手里多余的粮票, 有了粮票就可以给我们买馒头和糕点。懵懂的我听了, 立刻转忧为喜。

上了岸, 我们便走到一号路(现在的江川路)的居民区, 向小区里的“居民户”兜换粮票, 一只鸡蛋换半两粮票。当时“居民户”的定量也很紧张, 节余的不多, 所以满满一篮鸡蛋要换好几户人家。等到把鸡蛋都换完, 已近黄昏, 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母亲便带我来到闵行老街, 花八分钱下一碗小馄饨。那鲜美的滋味至今都能回味。母亲舍不得吃这种“奢侈品”, 花三分钱买了个大饼充饥。吃完东西再坐船回到西渡口时, 太阳已经落下。

还要赶十几里的乡间小路, 尽管腿很酸, 但换完鸡蛋后的心情愉快, 脚步轻盈, 伴着皎洁的月光走回家, 路途也好像缩短了许多。

为了换粮票, 就这样经常往返于渡口, 渡口便这样承载着我童年的欢乐, 同时也刻录了我的伤痛。记得一次换鸡蛋时, 母亲竟被一个中年妇女用半两粮票冒充半斤粮票, 骗

王火良

渡口, 卑微时光里的爱与痛



色达风景

(摄影)

沈丹锋

走了9个鸡蛋。可怜我母亲不识字, 我发现后就和母亲去找那女人, 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 于是便在原地等, 期待着那人能良心发现, 可等到天黑也不见她的踪影……看着委屈、疲惫的母亲, 我的屈辱、愤怒的泪水夺眶而出。

从那以后, 我暗暗发誓, 一定要发愤读书, 长大后也要做“居民户”, 拥有国家发的粮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 我终于成了一名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居民户”!

生活中会遇到无数考验的渡口, 人生也会遭遇历练你的爱与疼痛。但你只要怀着一颗向往未来的心, 任何渡口都能从容飞渡, 任何爱与疼痛都能成为强健脊梁的骨钙。

百叶包, 顾名思义就是用百叶裹住馅儿, 包成像春卷一样3寸左右的圆扁型长条。

做好百叶的百叶, 一定要用上好的薄百叶。母亲当年喜欢用南市豆制品厂的薄百叶, 说韧性好不容易碎, 且无豆腥味。里面的馅儿则按各人的口味而定。一般有纯肉的, 有菜肉的, 还有蔬菜、香菇、豆干加开洋拌成的。包裹之前, 要将食材剁碎, 加上盐、味精和料酒。

百叶包的烧法有好几种, 一种是放在油锅里略煎, 然后放些酱油红烧, 也称黄酱的, 这种烧法特别下饭; 一种是浸在鸡汤里清蒸, 上面撒几粒青豆, 出锅后, 只见清汤上垒着几只象牙色百叶包, 若干清翠点得恰到好处, 叫人垂涎欲滴; 还有一种就是把百叶包用棉纱细捆住, 三至五只一组, 放在三鲜汤里, 还未掀盖,

乱停车需堵但还要疏

王大庆

漫步在老小区, 发现一个揪心的问题, 就是处处乱停车, 有些住户甚至在自己房前的公共绿化地开辟出一块停车位, 浇上水泥, 作为己用, 以至于公共绿化遭到严重破坏, 东一块停车位西一块停车位, 让人看起来很不雅观。而因停车堵塞交通引起争吵的事件也不断发生。

因为“有机可乘”, 不少有小汽车的居民也纷纷仿效, 在公用绿地建造自己的停车位。一般都是在晚间搞突击, 在自己房前的公共绿化园地里挖掉树木和花草, 然后迅速浇灌混凝土, 至清晨已建成。虽然有关部门也曾联合执法, 花大力气将小区居民自建的水泥停车位统一铲除, 可事过之后, 车主们又故技重演, 将原来被铲除的水泥停车位撒上碎石瓜子片压土, 重新停车。

诚然, 有关部门严格执法是值得肯定的。可为何执法后乱停车仍卷土重来呢? 除了执法后期监管不力外, 焦点在于只考虑到整治而没有考虑到如何解决老小区停车难的问题。须知, 只有多管齐下, 科学合理地增扩停车场地和设施, 开发一切可停车的资源; 同时, 对破坏小区公共绿化修建停车位的行为严加监管, 才能使老小区停车难得到有效缓解。



七夕会

待客用。她早早把百叶包隔水蒸成八九分熟, 放在朝北的窗前。那香味, 馋得我们口水直流。这时, 母亲会关照我们, 来客人时, 三鲜汤里的百叶包, 客人不动筷, 你们小孩千万不能动筷, 并规定我们每人只能吃一只。

那时春节里来往客人多, 这顿吃不完的百叶包, 下顿组合后可重新入汤。三鲜汤端上来时, 锅周边黄的蛋饺, 棕色的熏鱼, 淡红的肉片等围着, 中间, 则是由下面白菜、粉丝衬着, 微微隆起, 用白棉纱线扎成一组组的象牙色的百叶包, 卖相真是不错。在砂锅盖头掀开的一刹那, 在热气缭绕中, 我总能看到母亲泛着光荣的笑容。

春节前, 几位老邻居小聚, 菜单上有只荠菜干贝百叶包煲, 几位曾吃过母亲烧的百叶包的邻居不约而同地说, 这菜比四婶(我母亲在弄堂里的称呼)烧的美味百叶包差远了!

美食

